

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申说

孙桂平

(集美大学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)

摘要:《文心雕龙》若成于齐末,刘勰可能没有机会全面了解陶渊明诗文,故未予品题;若成于梁初,则由于陶渊明诗文缺少文采,其人思想情感较为异端,故刘勰未予品题。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,设若没有萧统的推荐,钟嵘不一定会看重陶诗而列为中品。《〈陶渊明〉集序》对于陶渊明诗文的评论,大致应是萧统与部分东宫学士在“讨论篇籍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。

关键词:《谈艺录》 刘勰 《文心雕龙》 钟嵘 《诗品》 萧统 《〈陶渊明〉集序》

中图分类号:I 207.2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4580(2012)01-0015-(04)

钱钟书先生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,指出陶渊明诗文在齐梁间未能特彰。^[1]至于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,以及陶渊明诗文的影响为何在齐梁间由晦渐显,都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。对这些问题,本文拟加以申说。

一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不及陶渊明的原因

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云“晋代人文,略备于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篇,三张、二陆、潘、左、刘、郭之徒,无不标其名字,加以品题,而独遗渊明。”据罗宗强先生《〈文心雕龙〉的成书和刘勰的知识积累》一文统计,《文心雕龙》引及作家322人,未及陶渊明,^[2]此较钱钟书先生所论,更能说明陶渊明诗文在齐梁之际晦而不显。由于学界在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成书问题上,有成于齐末和成于梁初两种看法,^[3]所以本文按照这两种情况分别探讨。

沈约编纂《宋书》,记载传主文集行于世(传于世)的,有蔡兴宗(卷五十七)、范泰(卷六十)、王韶之(卷六十)、荀伯子(卷六十)、王微(卷六十二)、郑鲜之(卷六十四)、袁淑(卷七十)、颜竣(卷七十五)、沈怀文(卷八十二),申明传主文章行于世(传于世)的,有谢惠连(卷五十三)、谢灵运(卷六十七)、颜延之(卷七十三)、谢庄(卷八十五)、戴法兴(卷九十四)。《宋书》为陶潜撰写了传记,归在《隐逸

传》中,并未言及其文集或文章行于世(传于世)。根据中华书局1974年版《宋书·前言》里的介绍,宋书的最后定稿,当在萧鸾称帝(公元494年)以后,甚至在梁武帝即位以后。^[4]这至少可以说明,至南齐末年,陶渊明文集尚未行于世,其文章也不以文采见重于世。如果按照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于齐末来理解,刘勰之前一直依居于佛门,齐末身处定林寺整理佛经,寺庙主藏经、论,定林寺在文集和文章方面收藏并不宏富,而陶渊明文集和文章又并未流行于世,刘勰可能没有机会全面了解到陶渊明的诗文,那么自然不会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加以品题。

入梁以后,刘勰由“起家奉朝请”渐入仕途。从刘勰曾将《文心雕龙》献给沈约判断,他应该阅读过沈约编撰的《宋书》,至少会循此而了解陶渊明的生平和诗文。又由于刘勰天监三年至六年间曾任萧宏记室,至天监六年出任东宫通事舍人,有机会博览群书,应该能够读到在当时传世的陶渊明文集。据阳休之《陶集序录》,在萧统所编《陶渊明集》之前,陶集“先有两本行于世,一本八卷,无序,一本六卷,并序目,编比颠乱,兼复阙少”。^[5]其六卷本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附录“梁五卷,录一卷”,表明这是在梁代编成的。其八卷本,从行文次序判断,当编于六卷本之前,有可能编于梁代,也有可能是宋、齐旧本。^[6]由

收稿日期:2011-12-22

作者简介:孙桂平(1973-),安徽枞阳人,博士,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。

于阳休之在行文时将这两种陶集与萧统所编《陶渊明集》并列为三，根据语气判断，这两种陶集很可能在梁代为宫廷所收藏。可以说，入梁后刘勰有可能读到这两种陶集，或者读到其中的一种。如果谨慎些，我们至少可以说，入梁后刘勰应该有机会较为全面地了解陶渊明的诗文。如果《文心雕龙》编于梁代，那么该书没有论及陶渊明，就属于“不予择取”的情形。至于“不予择取”的原因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：

第一，陶渊明的作品缺少文采。《宋书·陶潜传》虽录入《五柳先生传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与子疏》、《命子诗》，甚至也注意到陶渊明行文的特殊之处“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。义熙以前，则书晋氏年号。自永初以来，唯云甲子而已”；但其主旨在强调陶渊明的文章体现了气节和隐逸之志，而并未推崇其著作的文采。钟嵘论陶诗，用了“文体省净”、“笃意真古”的评语，说明其诗语的质朴。阳休之《陶集序录》说自己阅读陶潜之文，感到“辞采未优”。这一点《谈艺录》说得很清楚：陶渊明的诗文缺乏文采，是整个南朝时期文坛的共识。但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没有注意到，鲍照仿作时用了“陶彭泽体”一词，这说明陶诗与当时“才高辞盛、富艳难踪”的诗坛主流倾向相异，并已自成风格，或者说，鲍照已经认识到，“反文采”是陶渊明诗文创作的自觉追求。那么，对于陶渊明诗文因为“反文采”而缺少文采的特点，刘勰也一定能认识到。显然，在《文心雕龙》这样一部崇尚“文章以雕缛成体”的论著中，陶渊明不宜被当成重要作家纳入讨论。

第二，陶渊明的思想情感较为异端。魏晋以至于南朝，文章的意义在评论家那里得到高度重视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认为“夫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陆机《文赋》认为，文章可以“济文、武于将坠，宣风声于不泯。”刘勰创作《文心雕龙》，正如学界所指出的，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。他在《序志》里陈述旧梦，说自己想通过“咀嚼文义”的方式为孔子传道，以使“余心有寄”。既然撰写《文心雕龙》被视为承载个人生命价值的事业，那么刘勰在选择评述对象时，就必然较为慎重。陶渊明是另类的文人：“少无适俗韵”，中年辞官“归园田居”，至晚年自号“五柳先生”率性度日。其行为，特别是自拟挽歌与祭文，若用儒家思想来观照，可谓离经叛道。在创作态度上，陶渊明不追求文章的社会价值“常著文章以自娱，颇示己志”。其读书态度也随意自适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，每有会意，

便欣然忘食。”对于精心校读过佛经又持志名垂青史的刘勰而言，陶渊明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自己迥然不同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再加上陶渊明文（诗）名未定，刘勰不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品题陶渊明，是在情理之中的。

二、钟嵘《诗品》将陶诗列为中品的相关问题

《诗品》将陶诗列为中品，后人或以此为弊，故作笺时将陶诗调整为上品，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力辩其非。但陶诗为何被列在中品，以及陶诗在钟嵘心目中是否已入上品，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深入探讨。后来，袁行霈先生撰《钟嵘〈诗品〉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》，认为陶诗在钟嵘心目中已入上品，只是因为源出位于中品的应璩，而不能跻身上品。^[8]这一说法虽有道理，但仍存商榷余地。

在钟嵘撰写《诗品》之际，文坛流行着对于陶诗的不良评价。①陶诗被视为“田家语”，此见载于《诗品》。“田家语”如曹旭所笺，指内容朴野无文，也指语音鄙俚乡气。^[9]②有人指责“陶渊明诗篇篇有酒”，这见载于萧统所撰《陶渊明集序》。从该说被当作误解而遭萧统驳斥推断，这一看法在当时很有影响，应已流传日久。根据学界看法，《〈陶渊明集〉序》最迟作于中大通三年（531）四月萧统病逝前，而钟嵘《诗品》定稿在沈约去世的天监十二（513）年至钟嵘卒官的天监十七年（518）之间，两者相距不到二十年。据此，如果我们认为钟嵘知晓或曾听闻“陶渊明诗篇篇有酒”这一流行贬语，当与事实出入不大。

那么，将陶诗录入中品，这是否钟嵘个人力排时议的行为呢？本文认为未必，因为陶诗被录入《诗品》的时间可能较晚。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指出，陶诗虽被录入中品，但其人只见于《下序》，而不见于《上序》、《中序》。《诗品》“三序”的形成与安置问题，是学术界迄今未有定论的难题。据蒋祖怡《钟嵘〈诗品〉作年考》，“三序”是先后成文的：上序和《诗品》初稿同时完成，中序是钟嵘决定把《诗品》送给沈约求答之后与送稿之前撰述的，而下序撰于沈约卒后。^[10]若按照蒋说来探讨“陶渊明不见于‘上序’、‘中序’”这一问题，则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钟嵘《诗品》初稿并未品题陶诗，所以“上序”、“中序”没有讨论陶渊明；在后来的修改稿中，钟嵘将陶诗添加进《诗品》，所以在“下序”中，“陶公《咏贫》得与二十二作者之数”。

由于资料缺乏，这一结论既难以证成，也难以证伪。但如果我们能够说明，在钟嵘晚年，有

某种机缘可能促使他改变立场而将陶诗录入《诗品》，那么这一结论就显得比较合乎情理。笔者认为，这一机缘是存在的，那就是钟嵘在天监十七年任西中郎晋安王萧纲的记室。

南朝时期隐逸盛行，崇隐是一时风气。受此影响，梁武帝尊崇何点、何胤、庾诜等隐士，而与陶弘景联系密切。《梁书》记载萧秀出任江州刺史时推崇陶渊明的故事：

及至州，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。秀叹曰：“陶潜之德，岂可不及后世！”即日辟为西曹。^[11]

据《梁书·简文帝本纪》，萧纲在任西中郎将之前的天监十四年五月至天监十六年六月间，在江州刺史任上，时年12-14岁。受家族文化的影响，萧纲在江州任上推重陶渊明，史书虽未及载，应是不言自明之义。萧纲曾自言“七岁有诗癖，长而不倦”，则其在江州任上，应该关注过前隐陶渊明的诗文。《颜氏家训》言萧纲“爱陶渊明文”，“常置几案间，动静辄讽咏”。颜之推既然未指出这是萧纲何时的习惯，那么就可以理解成是他一向的爱好，而这与其在江州刺史任上熟知陶渊明或许有关。

天监十七年，萧纲16岁。按照曹旭的观点，其时萧纲诗癖正盛。钟嵘既为其记室，即使从礼节的角度，也会将《诗品》赠送给作为上司的诗人萧纲。萧纲批阅《诗品》，由于其江州刺史卸任未久，如果发现《诗品》忽略了江州前隐陶渊明的诗作，就一定会给出建议：《诗品》应对陶诗加以品题。袁行霈先生撰《钟嵘〈诗品〉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》一文注意到，钟嵘对列入中品的诗人常有贬辞，惟独于陶诗不作贬辞。其所透露的，也许正是萧纲向钟嵘推荐过陶诗的消息。另外，《诗品》“下序”所称赏的陶诗“咏贫之制”七首，既非田园之作，也无一个“酒”字。这似从反面说明了，钟嵘对于“田家语”、“篇篇有酒”等有关陶诗的负面评论，一直是较为认同和在意的。

诸多迹象指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，如果没有萧纲的推荐，钟嵘是否会看重陶诗，还真不好说。钟嵘将陶诗列为中品，有可能是在照顾萧纲的意见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，则后世认为陶诗应被列为上品，不仅与时论相悖，即从简文更赏爱陶文推断，似也不符合萧纲本意。

三、“萧统解推渊明”的缘由

《谈艺录》“陶渊明诗显晦”条云：“当时解推渊明者，惟萧氏兄弟，昭明为之标章遗集，作序叹为‘文章不群’，‘莫与之京’。”对此，《管

锥编》又予申论：

谈艺之特识先觉，策勋初非一途。或于艺事之弘纲要旨，未免人云亦云，而能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，悟稀赏独，拔某家而出之：一经标举，物议金同，别好创见浸成通尚定论。如昭明《文选序》大都当时常谈，而其《陶渊明集序》首推陶潜“文章不群超类”，则衡文具眼，迈辈流之上，得风会之先。^[12]

这提示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到了萧梁这个时代，为什么到了萧统这里，陶渊明诗文能得到重视？

向来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比较重视《〈陶渊明〉集序》，而强调萧统对于陶渊明隐逸志节的认同。如有学者认为《〈陶渊明〉集序》写于“埋蜡鹅事件”发生之前，以萧衍为首的萧梁皇族有尊重隐逸之士的传统，萧统为太子，处于受父亲猜忌和兄弟嫉妒的位置，因此其表彰陶渊明既是在遵循家族文化传统，也不失为一种远避权势、无意纷争的政治表态。^[13]另又有学者认为《〈陶渊明集〉序》写于“埋蜡鹅事件”发生之后，此时萧统权力被削弱，皇位继承人的身份难保，产生了厌倦政治的消极遁世心理，通过阅读陶渊明诗文得到了安慰。^[14]这些学者从知人论世角度来解释萧统为何解推陶渊明，确实有一定道理。

但是，论者往往忽略了一点，萧纲《〈昭明太子集〉序》曾记述，萧统是水平很高的编书家：“借书治本”、“一见自书”、“降贵纡尊，躬刊手掇”、“高明斯辨”、“己亥无违”、“长正鱼鲁”。^[15]而《文选》与《陶渊明集》的编纂，证明萧纲所言不虚。根据相关研究，萧统之所以有很高编集水平，应该是受东宫文学活动长期影响的结果。

梁武帝立萧统为太子后，安排萧统在东宫主持大型集类书籍的编纂活动。据《梁书》卷八和《隋志》记载，昭明太子编纂过《古今典故》、《文言》、《正序》十卷、《古今诗苑英华》十九卷、《文章英华》二十卷、《文选》三十卷等。这些选集的编纂，应以大量别集和既有总集被调查为基础。

那么，萧统东宫众多别集和总集从何而来呢？最合情理的解释，是从萧齐秘阁继承而有。但《〈隋志〉序》明确说“齐末兵火，延烧秘阁，经籍遗散。”^[16]则萧统东宫的大量别集和总集，可能有小部分得自萧齐秘阁；但更多部分，应是东宫学士自编、重编或整理的。《隋志》大量别集和总集被著录为“梁若干卷”、“梁有若干卷”，说

明其书或在梁代初编，或在梁代重编，或在梁代被整理，这标志着集类特别是“别集”类书籍的编纂在萧梁时期得以大成。

据曹道衡先生《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》，萧统自立为太子时起，梁武帝安排在他身边的，就有当时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学家，如沈约、谢览、王泰、张充、陆倕、到洽、明山宾、殷钧、陆襄、张率、刘孝绰、王筠、张缅、萧子范、萧子显、萧子云、到溉、许懋、到沆等有名的儒者和文士，其中尤多文学之士。^[17]据藏书史，梁代藏书共分四个地方，东宫即其一。魏、晋、南朝时期，秘阁设秘书丞、秘书监、校书郎等，这说明藏书之所亦即编书之处。据此，梁武帝让东宫文学之士在萧统的名义下从事编集活动，当在情理之中。

据傅刚《〈昭明文选〉研究》，梁武帝曾在东宫设府置学士。^[18]天监十四年（515）萧统加元服之后东宫的确设置了学士，东宫成规模的文学活动也自此形成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萧统的东宫学士集团在文学创作上并未像其前的“永明诗人”或以后的“宫体诗人”那样，形成鲜明的特征。《〈昭明文选〉研究》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但对该现象产生的原因语焉不详。事实上，《〈昭明文选〉研究》在论述萧统东宫学士相关问题时曾引用了《梁书·萧统传》中的一段文字：

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无倦，恒自讨论篇籍，间则继以文章著述，或与学士商榷古今，率以为常。

但傅刚先生没有注意到，这则材料明确提到，创作活动（“文章著述”）并非萧统东宫文学事业的主要内容，而为编纂文学作品集进行的“讨论篇籍”行为才是萧统东宫的主要文学活动。

如果考虑到萧统东宫曾长期从事“总集”和“别集”的编纂事业，那么我们还可以这样解释陶渊明诗文为什么到萧梁时期、在萧统这里得到重视：此前的《陶渊明集》单行，由于没有比照体系，其集本特点不彰因而不为世所重；当众多别集在东宫同时被编纂时，不同文集相互之间就会产生鲜明的比较，而陶渊明诗文独特的面貌就会凸现得比较明显。笔者宁愿相信，虽然萧统张扬了自己的会心，但《〈陶渊明〉集序》对于陶渊明诗文的评论，大致应是萧统与部分东宫学士在“讨论篇籍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识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钱钟书. 谈艺录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 1984. 90.
- [2] 罗宗强. 《文心雕龙》的成书和刘勰的知识积累——读《文心雕龙》续记 [J]. 社会科学战线, 2009(4): 227.
- [3] 刘跃进. 《文心雕龙》成书年代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[J]. 文史知识, 1994(5): 88.
- [4] 宋书·前言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 2.
- [5]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. 陶渊明资料汇编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. 10.
- [6] [8] 袁行霈. 陶渊明研究 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117 - 196
- [7] (梁) 沈约. 宋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 2289.
- [9] 钟嵘. 诗品(曹旭笺注本)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. 2009. 157.
- [10] 蒋祖怡. 钟嵘《诗品》作年考 [J]. 杭州大学学报, 1989(2): 52.
- [11] (唐) 姚思廉. 梁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3. 343.
- [12] 钱钟书. 管锥编(第4册)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6. 1446.
- [13] 汪习波, 张春晓. 颂陶藏心曲 谦抑避雄猜——论萧统《陶渊明集序》的另一面 [J]. 中州学刊, 2003(1): 59.
- [14] 胡耀震. 萧统编《陶渊明集》的时间及其诗文“无丝毫胎息渊明处” [J]. 江汉论坛, 2004(11): 109.
- [15] (清) 严可均 校辑.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58. 3017.
- [16] (唐) 魏征. 隋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3. 907.
- [17] 曹道衡. 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4. 126.
- [18] 傅刚. 《昭明文选》研究 [M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0. 139.

(责任编辑 秦川)